



王信攝影

余光中去國千日談感觸

夏祖麗

去國千日，詩人余光中今夏從香港回到了臺北。在短短兩個星期的停留裏，沉寂已久的廈門街余寓又熱鬧起來了。不斷的電話聲，不停的訪客，「各式各樣的鞋子將他的玄關泊成一種詩的海港」（見「伐桂的前夕」一文），而詩人低沉緩慢的話語，和他美麗的妻子咪咪灰褐色的瞳子，爽朗的笑聲，使得這幢原來只有兩位長輩守住的大房子，突然生動了起來。

在香港中文大學三年，余光中是擔任中文系的系

主任。剛去時，由於他在文壇上的名望，和青年學子對他的欣賞，使得當地左派感到不安，他們的報紙刊物常常攻擊他。有些非純左派的刊物，偶爾對他也有點好評。那些前前後後罵他的文字，加起來也有十萬字了。像「盤古月刊」，就是一連三期用了五萬字的篇幅來謾罵他，文字中更波及顏元叔和夏志清。對於左派報刊的圍剿，他不屑答辯，更無退縮畏懼之感。他說：「這個感覺是以前沒有經驗過的。以前在國內也有論戰，也是身經百戰，但到底是自己人，友誼賽，小意思。這才是真正的不同，不過，現在我也慣了。」

在香港三年，他寫了不少文章，散文已够出版一本書了，這次他帶了回來，交給純文學出版社出版。詩，他寫的雖不如在臺灣多，但也有半本的份量了。他說：

「每天從清晨到午夜，一天四十多班九廣鐵路的班車（這是一條通往廣州的鐵路，從廣州看，叫做廣九鐵路，從九龍看，就叫九廣鐵路。）曳着黑烟來回奔馳着，南下又北上的千隻鐵輪輪番敲打，用鋼鐵火花，的壯烈節奏，提醒我，藏在谷底的並不是洞裏桃源

，住在山上，我亦非桓景，即使王粲，也不能不下樓去。」

於是他寫下了「九廣鐵路」這首詩：

你問我香港的滋味是什麼滋味
握着你一方小郵簡，我淒然笑了
香港是一種鏗然的節奏，吾友
用一千隻鐵輪在鐵軌上彈奏
向邊境，自邊境，日起到日落
北上南下反反覆覆奏不盡的邊愁
剪不斷輾不絕一根無奈的臍帶
伸向北方的茫茫蒼蒼
又親切又生澀的那個母體
似相連又似久絕了那土地
一隻古搖籃遙遠地搖
搖你的，吾友啊，我的回憶
而正如一切的神經末梢
這條鐵軌是特別敏感的
就像此刻，小站的月臺上
握着你的信，倚着燈柱



玉信攝影

就閉起眼睛，聽，我也能分出
那輕脆如叩而來的，是客車
那沉重如槌，轟天撼地而去的，是貨車
而一陣腥騷薰人欲窒的
閉氣吧，快，是豬車

他認為，這些文字，在臺灣是寫不出來的。雖然他去過金門，也有相似的感覺，但金門是不能去廈門的啊！像他在中國時報上發表的一首長詩「海祭」，就是描寫從大陸游泳逃出的二百多位青年的事。他們有的被鯊魚吃掉，有的被咬傷。他是為了同情他們而

寫的，意象上是寫鯊魚，間接却對彼岸的統治者有所批評。在香港沙田他的居所向北望是山，山後面就是大陸，他曾有所感而寫了一首詩「北望」，在詩的最後他寫到，向北望時，夜裏有一鉤冷月孤零零的在中國大陸上，好像聽到天安門隱隱的騷響。詩寫好後沒有多久，大陸上就發生天安門事件，他覺得非常巧合，而這方面的靈感，如在臺北是得不到的。

余光中曾三度去美國唸書，教書，又遠赴澳洲講學，這次在香港待了三年，與過去在國外的感覺是不是有些不同呢？他說：

「美國離臺灣那麼遠，離中國大陸也很遠，生活的形態完全不一樣。在美國那些年，我懷念中國的情緒是很熱烈的，可是熱烈中却有一種空洞、疏遠的感覺。」

「在香港，懷念的情緒更強，可是是有內容的。因為對大陸知道的很少很多。雖然在臺灣也有有關大陸的報導，但那是知性的，只是知道有這件事。而在香港，知道的往往是那些親身經歷的人親口對我說的，那就不一樣了，那是感性的。」

「以前在臺灣，我對中國的文化，對中國的命運的情緒很高昂，去香港以後，我的情緒不見得那樣高昂了，經過了壓抑之後，我覺得比較沉着一點了。在香港的電視上我常常看到有關大陸的報導，一切感覺都比較真實。以前我非常懷念大陸，可是在香港三年，反而不是那樣懷念了。一般人也許會覺得奇怪，因為靠得更近，應該更思念。但也正因靠近了，看得更

清楚了，在知道了大陸裏面的現實之後，我的詩一樣的、夢一樣的懷念倒要修正了。」

在香港三年，他覺得還有一點可以說的，那就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學開了一門「中國現代文學」的課，也就是從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這三十年間的新文學。這其間的作品，在臺灣所能看到的，大概只有幾分之一，而且大部分是徐志摩、朱自清、郁達夫等人的。但是另外在臺灣看不到的，也在他的教學範圍之內，他倒是花了一番功夫加以了解，也使他對這方面的作品的認識增加不少。他說：

「教課時，我大半用批評的態度，因此教了兩年之後，一提到某些作家，我就知道他們的虛實優劣，也就很容易寫出一篇文章來。目前我已寫了好幾篇，像批評聞一多、郭沫若、戴望舒和老舍的，最大的一篇是批評朱自清的，有一萬多字，這些都收集在「純文學」要出版的這本散文集裏。當然，我還沒有大規模地寫。」他寫的角度多半從文藝本身批評，就藝術論高下，政治方面下筆很少。他說：

「在臺灣，雖然看得到徐志摩、朱自清的東西，却不耐煩專門為他們的作品寫文章，因為我們的作品

早就超越他們了。一但教了這門課，不得不弄清楚，既弄清楚，順理成章的就寫出文章來，這對香港讀者，對我的學生也有交代。

「老實說，有關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的參考書不多，即使有，大多是左派的解釋，這點我有很深的感慨，因為我幾乎不能指定學生們參考書，指定到的大半都是不理想的，不是藝術角度差，就是見解偏激。

「同時，國內許多青年沒看過三十年代的作品，有一部分人覺得它很神秘，對它抱有一種幻想，我想我加以批評註解，也許也有助於國內讀者。」

近年來曾有人希望政府開放三十年代的作品，當我詢及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時，他認為這是一個大問題，恐怕一時是難以突破的。

坐在余府客廳訪問時，不時有余光中的電話，他總是不疾不徐的一一去接聽，然後又冷靜而有條不紊的繼續未完成的話題。往往在沉思之後，從他那低沉、緩慢的聲音中會吐露出一些誠摯而一針見血的句子。曾看過余光中的原稿，方方大大的稿紙上寫滿了清晰方正的，看起來屬於溫柔敦厚的字體，幾乎找不出

一個塗抹的筆跡，而這却是他沒有經過打草稿就寫下來的呢！由此可見詩人思路之清晰，筆下之順暢。就像在整理這次訪問的紀錄時，發覺他的話清晰而有條理，就像他詩及散文一樣，簡潔有力却又充滿了情感，幾乎不必費太大的功夫去整理。

這些年來大家談到現代詩，一下就會想到余光中，當初他和夏菁、覃子豪等人創立藍星詩社，給臺灣的現代詩壇帶來了一股新氣象，今天臺灣的現代詩是臺灣文壇上的一劑催生劑，而當年「藍星詩社」的這批人是有他們的功勞的。

年紀大的讀者，也許對現代詩沒有太大的興趣，但他們對余光中的散文却很喜愛。他的文字好，思路清楚，主觀却不偏激，而他的那種愛自己鄉土，愛自己國家的意識，表現在他的散文中，更給人一種激勵作用。

雖然他的年紀漸長，但因他一直在大學教書，不祇是傳授學問，更對年輕人有所啓發，所以他一直擁有大量的年輕學生和讀者。近年來，他和一些散文作者，也創出了一條新的散文路來。

一位作家能歷久不衰的擁有許多讀者，這是很值

得欣慰與驕傲的。

當我請這位具有影響力的作家回顧一下三十年來的臺灣文壇時，他很中肯的說出了他的幾點感觸：

「在我看來，現在文壇上似乎有點換代的感覺。

中年一代不是不寫了，就是寫的不上勁了。新人出現多了，這是很自然的，也是很好的一種現象。以我最熟悉的詩而言，新人中不少潛力大的，不過要說完全擺脫上代影響的就不太多了。

「以前的現代詩比較難懂，對社會有種冷漠感，比較個人化，也比較西化。現在，反其道而行，年輕這一代走的是明朗的路，寫的東西比較想擁抱社會，比較有同情，也比較肯寫平淡的東西，不一定要寫悲劇。

「我在楊弦的第一次民歌演唱會的說明書上，曾經說過，西方的現代詩、現代小說、現代畫傳來我國，常可分為兩個階段：第一階段是上山拜師，師傳教什麼，學徒就學什麼。第二個階段是下山闖江湖，師傳教的已感不够，必須因時制宜，就地取材，獨樹旗號。

「有人說楊弦的民歌像搖滾樂，那沒有關係，因

為現代歌還在上山拜師的階段，經過幾年，它慢慢的會吸收中國的精神，慢慢會回歸。像林懷民早期的舞是西化的，現在已慢慢中國化了。」

小說這方面，他認為回憶大陸的作品越來越少，以臺灣農村、都市做題材的越來越多。散文也是如此。散文，可以說分成兩條路：一條是朱自清、周作人、林語堂等人留下來比較傳統的新文學散文。一條是比較有現代感的現代散文，許多年輕人喜歡這條路。

這兩類散文有很大的不同。第一類散文的心理狀態較舊，偏向農業社會，要處理工業社會及表現七十年代的種種情緒感覺就比較遙遠。第二類散文很受現代詩、現代小說的影響，表現技巧較複雜，語言也接近詩些，是感性的，也比較接近我們。但是也許年輕的散文作者感性太豐富，而又沒有知性的支持，就成了感性的濫發，如果說文章裏面真有些什麼中心思想呢？那也未必。當然也有成功的，不過有不少實在是一種新的風花雪月。」

從文壇的回顧，我們談到了最近文壇上的熱門話題——鄉土文學。余光中認為，在目前，這是個很重

要的問題，將來這個問題還會引發不同意見的人寫很多文章。不過他說，他對這個問題也許沒有够深度的看法，但感觸却很多。

在說到「鄉土文學」時，我曾提到不久前訪問張系國時，他曾說過，臺灣的小說有兩種傾向：一是現代文學派，像王文興、白先勇。一是社會寫實派，像黃春明、王拓、楊青矗。不管那一派，他們的作品，多半表現某些固定的主題，而小說家無非是用一種技巧來表達一個已知的主題。張系國認為社會不是靜態的，歷史是向前的，人的經驗也會不斷改變，小說家也應該跟着時代改變。而最重要的，還是如何講出人的故事，而不是表現某一個固定的、僵化的主題。

因此當我要求余光中談談他對「鄉土文學」的看法時，他說：「我就從張系國來說吧！他是橫跨科學與文學的知識分子，也就是說他有兩種文化，一端文學，一端科學。這兩者他都能自由出入，像一般作家是進不了科學世界的。因此，他憑着他科學方面的修養，可以對現代文明批判得更深刻些，因為他懂得工業文明，都市文明。所以他可以寫像『地』那樣的小說，可以寫像『超人列傳』那樣的小說，也可以寫像

『棋王』那樣的小說。他是個特別自由，題材特別豐富，心思特別靈巧的作家，所以在這方面，他倒沒有代表性了，在他的角度，他可以常常覺得人家的題材太固定了，因為他很自由。

「同時，他在臺灣渡過了少年、青年時期，後來的歲月在美國，他的兩端是科學與文學，臺灣與美國，東方與西方。他的對照性很強，與一般人是不同的。」

「至於他分的兩派，在目前看來是這樣，是以這兩派最引人注意。不過，看臺灣文壇三十年來的發展，不能不提到臺灣的『老鄉土派』，這是我發明的名詞，那就是朱西寧、司馬中原、段彩華等人的作品，如果說黃春明、王拓等人是『新鄉土派』，那這些人就可以說是『老鄉土派』。再說，寫『滾滾遼河』的紀剛，寫『荻村傳』的陳紀澄，甚至孟瑤、張秀亞的作品，多少也寫到他們的家鄉，這還不是鄉土嗎！只不過是地理不同而已，但都是中國，你不能說那就不中國。」

為什麼現在特別有些作家在搞這個，一些理論家在強調這個，他認為理由有幾方面：

第一，我們臺灣在六十年代有頗大程度的歐化，尤其是詩和小說方面，無論在創作上或理論上，所謂存在主義或超現實主義曾經風行過一時。這點他要特別提出來，因為海外左派常常攻擊這一點，國內也有些人攻擊這一點。但他覺得，如果做個統計，當時走這條路的作家，佔的比例還是不多，大多數的作家還是有他們的中國民族性。何以存在主義顯得風行一時呢？那是因為當時少數人湊在一起去強調一件事，會顯得滔滔皆是，其他東西反而退入背景了。

而就因為六十年代有過西化現象，七十年代就來個反作用，就如同人的胃口一樣，一種文學形態發展到某種情況一定會衰落轉變。

他認為第二個是外在的因素。七十年代我們國家在外交上、國際形態上，有了大轉變，促成我們回頭來注意自己的東西。這可以說是一種補償。他說：「很多人談這個問題常常忽略了第三個因素，那就是『鄉土文學』並不是臺灣獨有的現象。由農業社會進入工商社會，知識份子住在大都市，對大自然或農村有所留戀，在美國也有這種情形。美國工業最發達，他們的民歌却也最發達，而他們的迷信也最發達

，像『大法師』一類的電影曾風靡一時。

「『鄉土文學』也是一種補償作用，當人們缺少大自然，對農村生活感到隔膜，失去泥土，失去根，對傳統的風俗節日，民間藝術感覺遙遠時，就要回去擁抱。更有些人覺得良心不安，覺得太忽略了卑小人物，所以就不再寫英雄、知識分子，回頭去寫小人物，這些也倒是自然的。」

「不過，存在主義可能有病態，寫『鄉土文學』也會發生偏差及過火的現象。我看到了何欣、彭歌他們批評有關『鄉土文學』的文章，頗有同感，我也寫過一篇『誰來晚餐？』就是討論這個問題。我認為似乎一定要寫農村、小人物，甚至悲哀的小人物才是『鄉土文學』，這是一種限制。」

「如果把『鄉土文學』做為擁抱鄉土，擁抱農村的現實，這是一種可貴的企圖。可是，如果這裏面的情緒發展為地域性的，甚至是排他性的，或階級性的，那就有點背離『鄉土文學』了。」他覺得寫工、農、漁、鹽他都很贊成，因為我們平時對他們也實在太不注意了，如果有作家成為他們的代言人，那是可貴可敬的。但這並不意味着，這樣就應該把知識份子貶

低，甚而批判知識份子。有些作家認為知識份子是不數，文學的重要注意力不應放在他們身上，這點他不贊成。他說：

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後，國中畢業生也是起碼的知識份子，再加上高中、大學畢業生，知識份子絕對在二百萬人以上，絕不是少數了。」

「有些人認為勞工神聖，努力者是可貴的，而勞心的知識份子不事生產，與農村工廠脫節，自命不凡，優越感太重。當然，中國過去幾千年社會是很強調『士』，其他階級是被忽略了。不過現在要反過來說勞心的知識份子就是胡思亂想的、惡劣的、卑鄙的、虛偽的，那我也不贊成。」

「我可以舉個例說，我們的十大建設動用了許多勞力，但勞心要不要呢，設計工程和工程所賴的機器不是勞力就夠的，那是需要勞心設計的。機器是勞心與勞力的結合，一定要分勞動大眾或非勞動大眾，我覺得不公平，而且不現實。」

「還有大專聯考，不分階級，人人都可以參加。大家受教育的機會均等。而在中國大陸，知識份子的子女不能進大學，這是常事了。所以我要強調，知識

份子在臺灣不是階級，只是教育水準的標幟。提倡工農兵文學的人，根本忽略了臺灣的現實。我們除了工農兵外，還有商人，尤其是國際貿易的『新商人』，我們不能沒有這個行列，而共產主義社會就沒有商人，主張這些論調的這般人在在國外早被呼為『老左派』，他們還停留在以前陳腐的觀念裏，認為社會只有工農兵所謂的無產階級，與地主、資本家的對立。

「為什麼不能有作家來表現商人？小店員？小學教員？為什麼一定要工農兵？我們實在應發展全民文藝，工、農、兵、商、公、教、自由職業，每行都應有人去同情他們，為他們發言，為他們做證。」

「『老左派』總覺得，一個國家要改革，一定要工人階級起來革命。其實以美洲和西歐為例，許多運動往往是青年發動，而工人是站在政府的一邊阻止的。在資本主義社會，工會已是個既得利益階級的代表，他們動不動就罷工，他們可使社會的生活癱瘓，他們的權力大，與馬克斯當年想像的根本不一樣。」

「同時，一路追下去的話，那鹿港人說鹿港是鄉土，屏東人說屏東是鄉土，那還分得完嗎？最後大概只有山地同胞才能成為名符其實的『老鄉』吧。」

三年不見，余光中此番回國，歲月已在他的兩鬢留下了痕跡，如今「兩個大陸的月色和一個島上的雲在他眼中，霜下來了，在耳邊」。明年，他將到「知天命」之年。從一個黑髮青睞的五陵少年，到「初雪已降臨在耳際」的人，我請他以一個中年人的心情回首過去與未來的感觸和期望。他沉思了一下說：

「感觸我倒是有，歷史學家湯恩比發表他的歷史觀時曾經說過，一種文化必須經常接受外來的挑戰，而加以克服，才能够生存，人也是這樣子。新的環境來了，就不應再戀戀於舊的環境，到不是隨風轉舵，而是要能掌握到新的，改變它的精神與意義。不但要適應新環境，而且要了解新環境，甚至領着環境變，影響環境變的方向。這對每個人都重要，對作家更重要。」

「以前一窩蜂攪存在主義，現在又一窩蜂弄『鄉土文學』。當然都可以留下成就，但恐怕大部分作家只是人云亦云，跟在背後起鬨吧！」

「談到隨着環境變，這點我覺得咪咪（余光中太太）她差不多可與我同時轉變，她有變的能力，並不

是說落在五十或六十年代就不能進展了。同時我也從我女兒身上看到了未來一代的徵象。她們是典型的臺灣人，臺北人，我希望他們能成為樂觀而進取的『新臺北人』。

「而我，我是福建人，也是江蘇人，抗戰時我在四川住過，也是四川人，我當然也是臺灣人。這只能說明，加起來我就是中國人。正如我在『在冷戰的年代』序詩裏寫的一樣：

一千個故事是一個故事

那主題永遠是一個主題

永遠是一個羞恥和榮譽

當我說中國時我只是說

有這麼一個人：像我像他像你

「我現在的感覺還是一樣，只有中國才是大鄉土，因為那是民族。唯有真正屬於民族的，才能真正立足於世界。這是我堅持不變的信念。爲了堅持這個信念，我曾經喪失了許多昂貴的友情。不過，一個決心遠行的人，原就應該有獨行的準備啊！」

余光中一再強調，最重要的還是堅定自己的立場，創造自己作品的生命。

作爲一個作家、一個詩人、一個老師、一個父親，一個中國人，在這動盪的環境中應如何立身處世呢？

他說：「對個人而言，應盡自己一份能力，把事情做好。不能因環境惡劣而氣餒，要接受挑戰。同時要鼓舞周圍的人。」

「對整個社會說來，應展望好的，準備壞的。不要抱太大幻想，應準備迎接可能來到的比較壞的日子，可能是政治上的，也可能是經濟上的。目前臺北的生活實在是舒服，我們要準備接受比較不舒服的。其實這也不算什麼，在抗戰時許多人都經過。」

「將來萬一有那麼一天，我們在國際上處境更艱困，我們要肯定自己的民族性，不要盲目的崇洋媚外。但也不需要來個大轉變，盲目的排外仇外，這兩種心態都是危險的。就像一個人，要完全依賴另外一個人是危險的，要完全排斥別人也是危險的。」

記得余光中說這話時，卡特將與北平建交的消息

正傳着，而他此番話，也許正是有感而發吧！就在這話說過兩個小時之後，范園焱義士駕米格十九自大陸來歸的好消息就傳來了。

最後，請他談談他在香港的生活，他說：

「香港這個社會跟臺灣不一樣，或者也可以說跟臺北不一樣。臺灣雖然也是慢慢工業化，可是多少還有一個人文的社會，還是很強調傳統文化。香港它是一個工商社會，做生意最要緊，社會形態跟臺北不一樣。另外，政治形態也不一樣，它是殖民地，不是國家，所以國家與民族的感覺，不像我們這邊這麼濃厚。再加上，語言方面是講廣東話，方言第一，國語不流行，教課和普通交流多少有點障礙的。」

他說，香港的生活一半是很傳統的中國社會，一半是西化的。這兩個極端常有很有趣的現象：比如一個穿着仍帶清朝味道的服裝，梳着廣東鄉下女人的巴頭的老太太，竟抽着美國的三五牌香煙。一部世界上最名貴、最漂亮的汽車，竟停在一條最古老、最擁擠的街上。他說：

「在這個環境下，我們可以吸收到許多東西，這

是很有趣的。」

他曾這樣描寫過他在沙田山居的生活：「海圍着山，山圍着我。沙田山居，峯迴路轉，我的朝朝暮暮，日起日落，月望日朔，全在此中度過，我成了山人。」

但是，每當他在香港的電視幕上，收看鄰區都市的氣象，漢城和東京之後總是臺北，是陰是晴？是冷是熱？總是讓他特別關心。當氣象報告員說，颱風自海上來，將掠過臺灣轉西，或是寒流自華中南下，氣溫要普遍下降時，那一刹那，他才幻覺這一切風雨雲霧原本是一體，拆也拆不開的。而當他看到那種移植自臺灣，叫「臺灣相思」的綠樹時，他會很激情的說出：「那樣美的名字，似乎是爲我而取。」

訪問結束後，余光中送了出來，踏着這條他所說的「拭也拭不盡的，是我的脚印和指紋。每一條窄弄都通向記憶，深深的」廈門街，在正午的陽光下，詩人的兩鬢隱隱閃爍着銀光，使我不禁憶起他在「聽聽那冷雨」中所寫的：「二十五年，沒有受故鄉白雨的祝福，或許髮上下一點白霜是一種變相的自我補償吧

。一位英雄經得起多少雨季？他的額頭是水成岩創成還是火成岩？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蘚？廈門街的兩巷走了二十年與記憶等長……。」



諾貝爾文學獎秘史

王鴻仁譯

定價60元（郵購八折）

郵撥：19274 書評書目社

諾貝爾文學獎確實是它
今世最大的文學獎金，是
和廿世紀的「政治文化」
有權解之緣。本書根據諾
爾基金會人筆案，爲您開
一粒「諾貝爾文學獎」。